

# 从国际化到区际化抑或从区际化到国际化 ——中国两大三角洲经济转型中的开放路径比较

赵 伟

**内容提要** 对于一国内部有限的地区来说,经济开放属于某种二重的开放,一重是区际开放,另一重是国际开放。本文通过对中国两大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1980-90年代开放重心变化的比较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如下观点:这两大三角洲的经济开放路径明显不同,长三角地区走的是先区际化后国际化的路径,珠三角地区则反其道而行之,先国际化而后区际化;但目前的发展趋向表明,两大三角洲的区域开放最终将殊途同归,达于区际、国际并行开放的境地。

**关键词** 区际开放 国际开放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外贸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作者赵伟,男,1955年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7)

##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个由众多地区构成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是在两个层次上同时推进的:一个是全国层次,另一个是地区层次,这两个层次开放所涉及的内容,显然不完全相同。作为整体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仅仅涉及国际层面,属于单纯的经济国际化,但在各个区域经济层次上,对外开放则属于某种二重的进程:一重涉及到国际层面,属于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另一重涉及到区际层面,属于区域经济的区际化。

通过比较研究,笔者曾经提出两个看法(赵伟,2001a):(1)工业化的先行经济之区域开放,至少呈现了两种模式,即不列颠模式与美利坚模式,其中前者之区域开放始于区际化而落于国际化,后者始于国际化而落于区际化,但最后则殊途同归,开放在两个层次上同时展开;(2)1990年代结束之前,中国区域经济开放仅仅走完了一般工业化国家的一半路程,这个阶段区域开放总体上带有重国际化而轻区际化的片面特色,但到了世纪

初期,已有明确的迹象表明,中国即将掀起持续的区际开放浪潮(赵伟 2001b)。故此,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在重演美利坚之区域开放模式,即区域开放重心由国际化始,而落于区际化的模式。然而,这仅仅是就中国经济总体上显示的趋向而言的;如若将改革开放的几个前沿地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在上述总体模式下,各个区域在两个层次(国际与区际)上开放的进程,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最近20多年以来在全国经济中一直占有“超重量级”地位的两大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下分别简称为“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区域开放路径的差异,尤其令人瞩目。

## 二、从国际化到区际化 抑或从区际化到国际化?

两大三角洲地区之区域开放路径的不同,首先可以从经济国际开放进程上看到,在所有差异中,三个差异最为明显:

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对外贸易扩张轨迹上。珠

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比长三角地区来得要早,从 1980 年代中期开始,该地区的进出口就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其后直到 1997 年,十数年间,贸易总额的增长几乎呈直线上升之势。但到了 1990 年代末期之后,出现徘徊,其中出口额连续三年停滞不前。与珠三角地区相比较,长三角地区外贸总量的快速扩张,晚了将近 10 年时间,直到 1990 年代中期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在那之前的 10 多年时间内,外贸增速一直很平缓,其中多数年份的增速要么低于 GDP 增速,要么与 GDP 增速持平。但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该地区的对外贸易也进入快速而强劲增长时期,并且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加速之势,加速势头迄今未见逆转。这一点与珠三角地区贸易扩张轨迹,尤其不同。如若将两大地区的外贸规模变化轨迹置于同一张维量图中,则从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9 年,便形成一个近似弯弓形的图形,其中珠三角地区变化轨迹构成弓弦,长三角地区变化轨迹构成弓背(参见图 1)。这种变化轨迹意味着,在转型前期,两大地区外贸规模差距趋于拉大,而后期则趋于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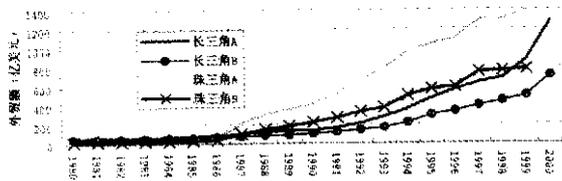


图 1 两大三角洲地区外贸扩张轨迹

说明:A 表示外贸总额,B 表示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0);外经贸部(2001)。

两大地区上述外贸规模变化差异,也为以往 20 年间这两个地区的外贸在全国外贸中所占份额的变化所反映。按照有关统计数据计算,经济转型起步初期(1980 年),长三角地区外贸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为 15%,外贸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 29.6%,珠三角地区这两个比重分别为 6.7%和 12.1%;13 年之后即 1993 年,长三角地区的同两个比重,一个略有下降,一个大幅度下降了。其中外贸总额在全国的比重降为 14.4%,略有下降,出口额比重降至 18%,比 1980 年降低了 11.6 个百分点。同一时期,珠三角地区的这两个比重得到大幅度提升,分别升至 40.9%和 41.5%。但进入 1990 年代中期之后,长三角地区的比重不断上升,珠三角的比重则出现徘徊乃至微弱下降趋势。

到 1999 年,前一个地区的两个份额分别升至 24.4%和 25.6%,后一个地区的份额则分别降至 38.9%和 39.9%。更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的份额一经开始上升,便非常强劲,迄今尚未有过逆转的记录(参见表 1)。

表 1 两大三角洲地区经济、贸易占全国的比重变化(1980 - 99 年)

年份	长三角地区比重(%)			珠三角地区比重(%)		
	GDP	外贸总额	出口总额	GDP	外贸总额	出口总额
1980	18.0	15.0	29.6	5.5	6.7	12.1
1984	17.2	12.7	22.2	6.4	6.7	9.5
1986	17.0	12.1	21.4	6.5	9.2	13.7
1990	16.6	12.1	16.9	8.4	36.3	35.8
1992	17.3	12.9	16.8	9.2	39.7	39.4
1993	18.5	14.4	18.0	9.9	40.0	40.8
1994	18.6	15.3	18.3	9.7	40.9	41.5
1995	19.1	16.7	20.0	9.8	37.0	38.3
1996	19.2	19.5	22.6	9.6	37.9	39.3
1997	19.7	19.7	21.8	9.8	40.0	40.8
1998	20.0	21.0	23.9	10.0	40.1	41.2
1999	20.8	24.4	25.6	10.3	38.9	39.9

第二个差异表现在区域经济之外贸依存度上。横向比较,到 1999 年,珠三角地区的外贸依存度高达 137%,其中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75.9%和 61.2%,大大高于长三角地区,后者的外贸依存度仅为 42.6%,出口与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24.2%和 18.5%。就是说,珠三角地区 GDP 的 3/4 以上要靠国际市场来实现,长三角地区的 GDP 仅有 1/4 弱靠国际市场实现,长三角地区外贸依存度明显低于珠三角地区。若纵向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两大地区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轨迹是不同的:过去 20 年间,珠三角地区的贸易依存度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抛物线形演进,即先大幅度上升,而后停滞,最后则趋于下降。其中依存度最高的年份是 1994 年,该年该地区外贸依存度曾接近 185%,出口依存度与进口依存度分别达 95.8%和 88.6%。自那之后,依存度连年下降。其中外贸依存度五年内下降了近 50 个百分点。由此似可推断,珠三角地区国际市场扩展的高峰期已经过去,1994、95 年可以看作该区域经济之外贸依存度攀升与下降的“拐点”(参见图 2)。与珠三角地区不同,长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则呈现出渐进式上升趋势,演进的路径呈阶梯形。整个演进过程以 1988 年为分界,呈现出前

后两个大的阶段:前一个阶段外贸依存度爬升缓慢,十数年间方由 10% 强攀升到 18% 强,后一阶段上升较快,连续在 1992、94 和 1999 年出现较大幅度攀升(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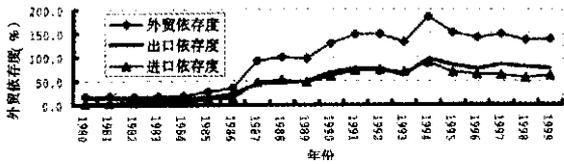


图 2 珠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变化(1980~1990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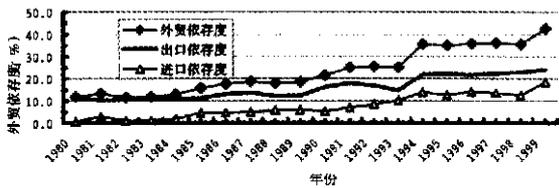


图 3 长三角(江浙沪)总体  
外贸依存度变化(1980~1999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0)。

第三个差异表现在利用外资规模上。表面上来看,两大地区引进外资规模变化轨迹相似,都是在进入 1990 年代之后才出现大幅度增加的,并且都是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调整的,但实际上则不然,实际上,长三角地区外资的大量流入,比珠三角地区晚了 10 年左右时间。在 1990 年代初掀起引资热潮之前,长三角地区年度引资额尚未达到 10 亿美元,累积引资规模不到 28 亿美元,而珠三角地区年度引资规模已突破 30 亿美元,此前累计引进外资接近 150 亿美元,分别是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加总的 3 倍多和 5 倍多。但在 1990 年代中期掀起的全国性利用外资热潮中,长三角地区急起直追,两个地区的差距迅速缩小。到 1990 年代末,珠江地区年度引资规模,仅相当于长三角地区规模的 100 - 110% (参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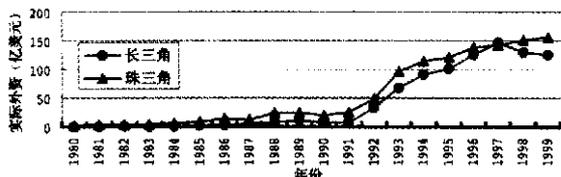


图 4 两大三角洲利用外资规模变化(1980~1999 年)  
说明:表中数据为实际利用外资额(下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0)。

差距的缩小反映在投资之外资依存度变化

上。早在 1980 年代,外来投资就成了珠三角地区最主要的投资源泉,该地区投资之外资依存度(外资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份额),在 1983 年就突破 10%,1986 年突破 20%,1992 年突破 30%,94 年突破 40%,而从 1994 年以来,一直在 40~50% 之间波动。相比较来看,在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的头 13 年时间(1978~1991 年)内,外资所起作用微乎其微,反映此种作用的外资依存度,多数年份仅仅为 1~2%,1991 年尚未超过 5%。但是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重要性迅速提高。外资依存度在 1992 年突破 10%,1993 年突破 15%,1994 年一度曾突破 20%。此后便在 17~20% 之间波动(参见图 5)。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目前长三角地区之外资依存度仍大大低于珠三角地区,并且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波动较大,但由于长三角地区内部资本形成能力强,投资增速高,因此 1/5~1/6 的外资依存度,已不可谓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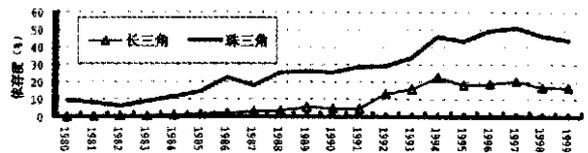


图 5 两大三角洲地区投资之  
外贸依存度变化(1980~1999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99,2000)。

上述三个差异清楚地表明,在区域经济开放进程中,珠三角地区之国际开放,比之长三角地区要早,取得突破的时间至少早 10 年。就是说,先于长三角地区十数年时间,国际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已经作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发挥作用,相比较而言,无论在区域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还是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长三角地区都滞后了 10 年左右时间。这一差异显然有力地印证了经济界关于珠三角经济发展动力的一个普遍的说法,即“开放优势说”,认为该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了对外开放,所取模式属于“以开放促改革”的模式,却不能印证经济界关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模式说。

关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与模式,经济界较为流行的说法属于“体制优势说”,认为这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超前性的体制改革,或超前性改革促成的体制优势。此说虽然切中了问题的实质,同时亦为江、浙经济尤

其为浙江经济发展与企业改革进程之间的极大相关性所证明,却不能解释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市场与投资基础。而缺乏市场、投资,再好的体制也无法促成经济快速增长,此理显然不说自明。故此要解释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之动因,除转型基本模式判断之外,还应将市场与资本形成因素考虑在内。

如若考虑市场与资本形成因素,便可依次进行三个推断:其一,在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较低背景下,一个地区经济之快速增长,只能依赖国内市场与国内资本。而一个大国内部最大的市场与投资源泉,无疑存在于跨区域范围内,而跨区域市场的开辟、资本的吸纳则与该地区经济的区际开放进程密不可分。其二,如果说,在迄今为止的快速增长中,珠三角地区主要依靠了国际市场、外来资本,那么,长三角地区则主要依赖了国内市场及内源性资本。显而易见,前者主要是通过区域经济国际开放获得的,后者主要是通过区域经济区际开放获得的。其三,以 1990 年代中期为界限,这两个地区经济赖以快速增长的市场与投资,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在那之前,外贸、外资对于珠三角经济的重要性上升迅速,但对于长三角经济之重要性上升缓慢;在那之后,这两个因素对于珠三角经济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但对于长三角经济之重要性,迅速上升,其国际市场重要性上升尤其迅速。这种变化说明,1990 年代中期之后,长三角地区经济国际开放步伐加快,而珠三角地区经济区际开放步伐加快。

笔者认为,上述差异及其变化趋向,实际上反映了这两大地区经济之二重开放路径的不同:珠三角地区采取的路径,属于先国际后区际的路径,即在若干年内,先将开放重心置于国际一边,在国际开放上取得超常规进展,而后以国际开放为依托,拓展国内区际开放;与珠三角地区不同,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开放,则采用了先区际后国际的路径,即先从区际一边突破,而后以区际贸易与区际要素流动为依托,大踏步进军国际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推进区域经济国际开放。

### 三、两种区域开放路径形成的原因

无论怎样推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两大区域经济在开放进程中所采取的路径,显然是不同

的。但这里值得探讨的,显然不仅仅在于证明两大区域开放路径的不同,而且在于解释促成这种不同路径的原因。

对于这两大地区经济在国际开放方面的“时间差”,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三个因素:其一为政策因素,主要是中央政府的开放政策因素。我们知道,在 1990 年代初期之前,中央政府对(境)外开放的所有优惠政策,几乎全给了珠三角地区,而置长三角地区于相对不利的政策环境之下,后者得到同等优惠政策的时间,至少晚了 13 年时间,且一度仅限于上海浦东;其二是区位因素,尽管两大区域都属于沿海地区,但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早期国际开放的区位条件更为优越;其三是传统外贸体制因素,计划经济时期,“广交会”外贸体制赋予珠三角地区极高的对外贸易声誉,经济转型头十数年间,这种外贸体制既赋予珠三角地区以中国外贸“窗口”的特殊品牌优势,又使该区域继续享有对外经济联系中心的优势。

对于珠三角地区来说,既然有如此之多的优势条件,国际开放自然优先于区际开放,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既然在所有这些国际开放条件方面,都暂时处于劣势地位,要拓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先从区际开放入手,显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然而问题是,转型初期的长三角经济,是否具备大规模区际开放的条件?笔者研究提出(赵伟,2001),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早期的区域开放,通常肇始于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另一个是繁荣的地区(内)贸易。一般来说,正是私有产权制度促成了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与地区贸易的兴旺,而兴旺的地区贸易,则成为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总体上来看,转型初期的中国经济并不具备这些条件,长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扼杀了这两个条件。但就具体地区来分析,便不难发现,长三角地区多少有些“例外”,在这个地区,上述两个条件是以隐蔽(或变种)的形式存在的。计划经济末期,长三角地区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城乡集体企业,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改革起步时期的 1978 年,该地区乡及乡以上行政区,就有 4 万多家非国有的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总数的 80% 以上,同时还有数量众多的非国有商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无一例外地按照集

体经济形式组织,但在产权上属于非国有的,其经营受潜在市场力量的影响要比受计划影响大,具有内在的交易动机,此其一。其二,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江、浙、沪两省一市之间的国有经济、正式部门受行政藩篱束缚,不存在大规模的区域贸易,只存在计划(调拨)安排下的区域分工,但在集体经济(包括农村集体经济)、非正式部门之间,却存在着一个隐蔽的区域市场,加之江、浙、沪三地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个隐蔽的市场是无法人为毁灭的。

上述隐蔽的条件,一旦遇到适宜的环境,势必形成燎原之势。事实证明,先是社队集体企业,而后是城乡个私企业,最后是笼统地被称为“乡镇企业”的非国有企业的大发展,掀起了长三角地区工业化浪潮。统计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仅仅两年时间,长三角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数量便突破6万家,产值200多亿元,占总额的47%(参见表2)。这6万多家非国有工业企业,实际上是拓展该地区区域内市场与跨区域经济贸易网络的微观经济主体。这个主体,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而迅速壮大:到1990年,仅在“工业”内部,其产值已占到总额的一半以上(参见表2)。与此同时,江、浙、沪正式部门之外隐蔽市场迅速公开化,转化并带动着区域内经济的整合。

表2 两大三角洲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比较 单位:%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数量 比重	产值 比重								
上海	58	23	56	22	41	22	66	30	77	62
江苏	83	39	85	59	89	59	89	66	88	79
浙江	85	39	88	63	92	63	86	69	88	86
长三角	76	24	83	47	87	46	84	56	86	77
珠三角	74	27	77	43	79	44	87	60	84	82

注释:1. 表中数据仅含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

2. 1990年之前非国有企业仅含集体企业,之后含集体、个体与“其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1986,1992,1996,1999)。

除了上述条件而外,促成长三角地区经济区际化推进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两个因素较为突出:

其一是计划经济之大区域分工惯性因素。计划经济时期,长三角地区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其精良的工业制成品通过计划渠道行销全国,计划主导下的大区域分工使该地区具有突

出地位,在后来的制度转型中转化为区域品牌优势,其中上海制造品在全国的品牌影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事实证明,江、浙地区尤其是浙江私营制造企业的发展,最初在很大程度曾得益于此种品牌优势。直到1990年代中期,江浙中小企业还在合法或非法地利用这种品牌。

其二是制度转型模式因素。虽然中国的区域开放主要受政策因素左右,但随着体制改革的展开,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及能力与日俱增。前已论及,珠三角之转型模式,属于以开放促改革的,带有外资导向的特征,外资企业之产权虽然是明晰的,也具有开辟中国区际贸易的主观意愿,但在进入条件方面却受到限制,尤其是早期实施的要求外资企业自求外汇平衡、限制其产品内销等TRIM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限制了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国内市场。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地区的两大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现在是浙江模式,参见赵伟,1999),进入国内市场不受限制,因此发展区际贸易条件比珠江模式优越。

如果说,正是上述因素导致了两大三角洲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区域开放路径,那么,一当这种路径选定,在最初的发展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区际/国际开放彼此替代趋向。美国经济史家林斯特罗姆(Linstrom, 1980)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工业化的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着明显的区际交易代替国际交易的倾向,其中东部经济中心费城的替代最为典型。在工业化的多半时间内,该地区的国际贸易与区际贸易的比率,一直呈递减之势。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替代,可以解释如下事实:在美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虽然外贸依存度一直很低,但其经济增长率却不低。正是替代国际贸易的区际贸易,代替了相当一部分国际分工。反观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外贸发展轨迹,尤其是这两大地区外贸在全国的比重变化(参见表1),便不得不承认,这两大地区在转型的前十数年时间内,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开放替代因素:珠三角地区在以国际分工代替部分国内分工,长三角地区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区际贸易代替国际贸易。尽管这种替代只是发生在相对意义上,但可以推断,正是这种替代,在相对意义上放大了两个大区域各自的开放重心。

#### 四、区域开放: 下一步发展的趋向及意义

先行工业化经济区域开放的经历表明, 无论一个地区最初开放重心置于国际一边还是区际一边, 只要属于市场经济, 市场力量最终会促使其呈现出某种殊途同归的趋向: 区域开放同时在两个层次拓展: 一个层次是国际的, 另一个层次是区际的。由此似可推断, 虽然中国两大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之二重开放最初的重心大相径庭, 但按照先行工业化经济区域开放显示的一般规律, 到一定阶段, 两个地区的经济开放, 应该出现殊途同归的趋向。事实似乎已经显现出了这种区域开放的趋同趋势, 前述两大地区外贸、外资规模变化轨迹, 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外贸依存度的抛物线形变化与长三角地区阶梯形变化轨迹, 已经显示出这两个区域下一步开放演进的趋向: 珠三角地区在继续保持较高国际开放度的基础上, 将加大区际开放, 长三角地区将以已经形成的区际开放为依托, 加快国际开放进程。在区域经济二重开放进程中, 两个地区最终将殊途同归, 达于国际、区际并重的开放格局。

客观地来分析, 进入新世纪之后, 这两个地区经济之二重开放的条件, 也在趋于一致化。其中三个条件的一致化最为明显, 对于区域开放模式的变化, 也最具影响力:

第一个是国际化开放政策环境的一致化。部分地出于兑现加入 WTO 开放市场的有关承诺考虑, 部分地出于遏制已经相当大的沿海—内地经济差异之目的,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开始了大幅度的调整, 总的趋向显然是: 全国范围内开放政策的一致化, 改变对外开放政策之厚此薄彼、内外资本有别的区域政策。政策的调整不仅可望使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龙头——上海将浦东政策浦西化, 而且可望使其两翼——江、浙经济的开放政策环境与珠三角地区一致起来, 使这两大地区经济之国际开放, 不再有政策落差。政策环境的一致化, 无疑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的国际化开放, 同时使珠三角地区失去某些独有的政策优势。

第二个是区际化开放环境的一致化, 这也与中国加入 WTO 进程有关。随着中国加入 WTO 进程的加快, 外资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国民待遇”正在扩大, TRIMS 限制正在减少, 最终将完全

与国内企业拉平 (Zhao Wei, 1998), 而随着中国落实“入世”的重要承诺之一——开放国内贸易, 将使外资企业可以自由地在内地销售产品。这一变化, 无疑将有利于珠三角地区企业进军内地市场, 因而势必将促成该地区经济的区际化热潮。

第三个是区际交通运输、通讯条件及成本的一致化。我们知道, 区际贸易、区际投资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前提是便利而廉价的交通运输、通讯系统, 客观地来分析, 目前限制中国区域层次经济开放的最主要因素, 除了人为的制度性因素而外, 就是交通、通讯因素。这些条件, 在这两大三角洲地区并非划一的。一般地来分析, 长三角地区由于依托中国最大、通航能力最强的河流, 同时处于南北交通枢纽地位, 因此与中国工业化水平较低的大区域的联系, 比之珠三角地区要便捷一些, 因而在区际开放方面曾占有某种优势。但随着近年以启动内需为目的的交通、通讯设施投资的大幅度增长, 珠三角地区之内向交通条件已大为改善, 该地区与西南、西北欠发达地区的交通联系日益密切, 而电信行业垄断的弱化, 新兴技术手段的应用, 则有利于拉平区际远程通讯成本。所有这些, 在促成区际贸易与投资总体流动加速的情况下, 将使区域间之区际开放基础条件趋于一致。而更为便捷、便宜的区际交通、通讯联系, 无疑有利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强化, 尤其有利于岭南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内向区际拓展。

可以预料, 在上述诸因素推动下, 这两大三角洲地区将在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上同时展开竞争, 两个地区之间的竞争, 对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 何尝不是福音。这种竞争在国际上将有利于中国经济总体国际化推进, 在国内则无疑将有利于在大区域范围内资源的重新配置, 由此在总体上提升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 五、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提示

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时涉及到三重意义的变革: 第一重是资源配置形式的转换, 第二重是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 第三重是经济活动层次的提高, 可以分别称之为体制的市场化、经济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及现代化。这三重的转型, 同时在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两个层次上推进。而在国民经济与区域经济两个层次之间, 转型内容

最大的差异,显然存在于开放内容的界定上,因此,对于中国两大三角洲经济的比较,最有意义的地方,可能在于其各自经济的开放路径上。

通过比较,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两大地区各自之国际开放主要变量变化轨迹显示,在国际与国内二重之开放进程中,它们的路径是不同的:珠三角选择的属于先国际开放后区际开放的路径,长三角地区选择的则属于先区际开放后国际开放的路径。当然这里的“先”与“后”仅仅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就是说,两大地区在区际、国际开放进程重心上有相对差异,而非绝对差异。其二,导致两大地区经济之开放路径不同的原因是多重的。但如下因素起了较为重要作用:(1)中央政府区域有别的开放政策;(2)传统体制下计划安排的大区域分工之惯性因素;(3)制度转型模式因素;(4)开放替代因素。其三,虽然两大区域经济开放路径不同,但从国际开放主要变量变化的趋向可以推断,未来两大三角洲地区的区域开放,将趋于一致。两大三角洲地区之区际与国际层次的竞争,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结论仅仅是在分析、比较两大地区国际开放主要变量的基础上得出的。由于出入一国(或一个关税区)关境的货物与资本,要受到海关的监管,因此地区层次上的国际开放,有较为完整的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相反,由于出入一国(或一个关税区)内部各区域间的货物与资本不受区域当局的系统监管,因此便没有(或几乎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可资利用,由此,我们对于区际经济交易规模,无法准确测算。由于资料上的非对称性,上述两大区域经济开放路径,只能属于某种理性推断。推断显然是建立在一些合理的假定条件基础之上的,主要的假定有:(1)在一个区域经济规模及其变化为已知的前提下,该经济的市场规模是一定的;(2)在区域投资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储蓄率为已知的前提下,该区域对于外来资本的需求是一定的;(3)一个区域经济国际开放变量完全属于该区域的国际变量,而排除了过境贸

易与要素流动因素。客观地来分析,在这三个假定中,(1)是完全合理的,(2)基本合理,但暗含了另一个假定:在中国的这两大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储蓄率均没有大的差异,因而对于外向(国际或区际)资本需求是不相上下的;但(3)的合理性可能较差,因为两大地区都存在巨额的过境贸易与过境要素流动,并且两个地区的流量是不可能划一的。

#### 主要参考文献:

1. 库兹涅茨(1991):《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
2. H. 钱纳里等(1989):《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3. 国家统计局(1999):《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
4. 国家统计局(1983,1992,200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5. 浙江省统计局(2000):《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6. 江苏省统计局(2000):《江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7. 赵伟(2001a):“区域开放:中国的独特模式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浙江学刊》第2期。
8. 赵伟(2001b):“中国经济:即将掀起一场区际开放浪潮”,《经济学消息报》,No. 439。
9. 赵伟(1999):“温州力量”,《经济学消息报》11月26日。
10. H. Armstrong, etc. (1993), *Regional Economics and Policy*, N. Y.
11. Linstrom, Diane (1980), *Domestic Trade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Genn Porter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Vol. I, Pp. 264 - 266.
12. Zhao Wei (1998), *China's WTO accession: Commitment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World Trade*, Geneva, Vol. 32, No. 2.
13. Zhao Wei (2000), *Die Rolle der Oeffnungspolitik fuer die regional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Beitraege zum Symposium regionale Wirtschaft und Politik*.

责任编辑 董希望